

反动势力的支持与德国法西斯的兴起

吴友法

德国法西斯兴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希特勒自身的主观原因外,还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其中德国反动势力的扶助和支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德国法西斯的兴起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产生阶段(1920—1923)、危机阶段(1924—1928)、发展阶段(1929—1933)。产生阶段虽然希特勒发动啤酒店暴动失败了,纳粹党被取缔,希特勒被捕入狱,但它奠定了法西斯兴起的基础,不可忽视。发展阶段是法西斯迅速崛起,希特勒通过议会道路夺取政权的重要时期。

德国法西斯的兴起是在反对魏玛共和国的背景下实现的。希特勒这种公开的反对政府的活动都是在德国反动势力支持下进行的。在纳粹党产生阶段主要是以巴伐利亚邦驻军和军国主义分子支持为主,在复兴阶段主要是以垄断资产阶级的支持为主。

魏玛共和国是社会民主党右翼篡夺了“十一月革命”成果建立起来的,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掌权的共和国,它推翻了半专制主义的君主立宪政体,对于威廉的第二帝国来说,自然是历史的进步。可是,魏玛共和国从她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背上了承担接受《凡尔赛条约》责任的黑锅,从而遭受不幸的命运。

这是因为《凡尔赛条约》使德国丧失了八分之一的国土,十分之一的人口,领土分割,资源丧失,德国的全部殖民地和国外投资都由战胜国加以瓜分和没收。协约国通过条约还严格限制了德国的军备和国防,莱茵河左岸地区被协约国军队武装占领,协约国还直接掌握了德国的税收、海关、铁路、河流、港湾及其他公共机关。《凡尔赛条约》还要强迫德国向协约国交付大量的赔款,还要承担协约国占领军的全部费用。《凡尔赛条约》给德国人民戴上了一付沉重的枷锁,它是一个压榨德国的肮脏条约,“是一个高利贷者的和约,刽子手的和约,屠夫的和约,他们把德、奥抢劫一空,弄得四分五裂。他们剥夺了这两个国家的全部生活资料,使孩子们挨饿,甚至饿死。这真是骇人听闻的、掠夺性的和约。”^①《凡尔赛条约》的目的就是让德国背上战败的“耻辱”的黑锅,把德国置于死地,阻止它重新变成战胜国的竞争对手。

《凡尔赛条约》签订后,德国成了一个不和睦的家庭,魏玛共和国成为大家不喜欢的政府,在政治上陷入四面楚歌之中。代表容克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保守派,害怕要承担《凡尔赛条约》的赔款负担,反对政府接受《凡尔赛条约》;民族主义者和旧帝国政体的支持者,也攻击魏玛共和国,反接受《凡尔赛条约》;军国主义分子不承认在战争中的失败,他们虽然在《凡尔赛条约》签字时,认为没有力量阻止协约国的进攻,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把政治权力交给右翼社会民主党,表示支持民主政体,也同意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可是,条约签订后不久,这些军国主义分子摇身一变,把德国失败、接受耻辱条约的责任全部推在魏玛共和国身上。

其实,《凡尔赛条约》根本没有触动德国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结构,军火大王、大

银行家和容克地主的财产毫无触动。德国军队的威信也丝毫没有受到损害，德国军官团原封不动的被保留下来，“头号帝国主义分子威廉的社会基础——军国主义团体仍然存在”^②。这些军国主义分子对一战的失败、对政府接受《凡尔赛条约》耿耿于怀，伺机寻求民族复仇主义势力。

希特勒也是一个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复仇主义者，他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听到德国政府要接受《凡尔赛条约》的消息后，禁不住失声痛哭。他说：在这些夜晚，我的心中滋长了仇恨，对那些干出这样事来的人的仇恨。”^③从这以后，他就产生了要做一个政治家的意念，说什么“我终于看清了我自己的前途，我决心投身政治。”^④

希特勒认为，德国战败，从而接受民族最大耻辱的象征——《凡尔赛条约》，是“十一月革命”即马克思主义的犹太人出卖的结果^⑤，在背后中了他们的“暗箭”，正当德军在前线奉命发动最后总进攻的时候，他们在国内实行总罢工，从而鼓励了协约国军队，使他们取得了胜利。他进而把“十一月革命”和魏玛共和国划等号，所以德国战败的责任应由魏玛共和国承担。

出于民族复仇主义和反对魏玛共和国的政治目的，希特勒在巴伐利亚慕尼黑组织了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纳粹党）。纳粹党一成立，就把矛头指向魏玛共和国，到处张贴“共和政府是犹太人交易所与投机者的政府”、“打倒十一月事件的罪人”等宣传标语，叫嚷要推翻魏玛共和国。在慕尼黑聚集了一批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一战中陆军参谋长鲁登道夫和一些心怀不满的退伍军人都定居在这里，这些人是纳粹党的支持者和保护伞，成为纳粹党滋生和繁殖的重要土壤。

在经济上，纳粹党得到军国主义分子的不少资助。希特勒梦寐以求要办一份报纸，扩大纳粹党的宣传，在国防军少将埃普和罗姆帮助下，由军方资助了六万马克买下了一家由于亏本、负债累累而宣告拍卖的“人民观察报”。这份报纸在为扩大法西斯的影响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希特勒在纳粹党产生阶段主要是想通过暴动，进而推翻柏林政府，夺取全国政权。希特勒在掌握武装、密谋暴动方面都得到巴伐利亚驻军的支持。

1922年10月27日，意大利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在军队保持中立的情况下，一举夺得了意大利政权。这次暴动没有发生战斗，没有危害王室的权利，希特勒认为这是他理想中的“革命”的范例，极为崇拜，也决心依靠军队的支持，实现进军柏林的计划，这一尝试行动的机会便是1923年的鲁尔危机。

德国政府由于拖延拒付战争赔款，法比军队进驻鲁尔重工业区，从而破坏了德国的经济组织，加重了德国财政危机。在人民群众的抗议下，政府宣布实行“消极抵抗”，纳粹党却反对政府的“消极抵抗”政策。鲁尔事件发生后，希特勒准备在慕尼黑的十二个地方于1923年1月27日和28日举行反政府集会，并进行露天军事大检阅。巴伐利亚政府认为纳粹党集会有讨伐政府暴动之嫌，禁止纳粹党进行露天军事大检阅。正当希特勒处于绝望之中的时候，又是在罗姆和埃普等人出面帮助下，挽救了希特勒。两位军官愤怒控诉政府对纳粹党的所谓“爱国行动”采取了不能忍受的手段，指责政府背负了“爱国”的主张。巴伐利亚驻军司令洛索夫也认为希特勒“这个人是诚实的”，并告之巴伐利亚政府，纳粹党举行的大会是无害的，请政府取消禁止希特勒开会的决定。在军队的支持下，政府终于让步，希特勒取得了胜利。这次集会后，纳粹党影响迅速扩大，参加纳粹党人蜂拥而至，1923年发展到三万多人。

希特勒深知，仅仅依靠纳粹党是很难达到推翻魏玛共和国的目的。他同罗姆联合巴伐利

亚的军人组织，如“帝国国旗会”等四个武装的“爱国”团体，组成了一个“祖国战斗团体工作联盟”，鲁登道夫为这个联盟的首脑。联盟成立后，希特勒策划在“五一”暴动。在罗姆筹备和安排下，巴伐利亚驻军给“战斗联盟”提供了大批武器。这次政变计划由于一部分联盟成员叛变而流产了。

由于巴伐利亚聚集了一批反革命势力，成了反革命的巢穴，希特勒的反政府行为得到巴伐利亚驻军的默许和支持，巴伐利亚政府也没有给予有力的镇压。希特勒这时还没有获得德国国籍，完全可以借机将其驱逐出境。巴伐利亚政府不仅没有这样做，在“战斗联盟”各团体及右翼势力支持下，法庭根本没有勇气对希特勒进行宣判。

德国结束鲁尔的“消极抵抗”后，由于中央政府遭到各派势力的反对，为防止德国陷入内乱，埃伯特总统宣布了紧急状态法，把执行权力交给了国防部长奥托·格斯勒和陆军司令冯·西克特将军。巴伐利亚政府不愿接受这一解决方案，同政府产生了尖锐矛盾。欧根·冯·克尼林领导的巴伐利亚邦内阁于9月26日宣布了紧急状态法，任命了极端反动的帝制派、天主教巴伐利亚人民党领袖冯·卡尔为邦长官。卡尔企图使巴伐利亚脱离德国，另外建立一个依靠法国包括奥地利和莱茵区在内的多瑙河联邦。柏林中央政府西克特曾命令洛索夫封闭“人民观察家报”，洛索夫没有执行这一命令，1923年10月24日被受免职处分，但巴伐利亚政府又恢复了他的职务，卡尔宣布洛索夫继续担任巴伐利亚驻军司令，这实际上是向柏林政府宣战。卡尔上台，洛索夫背叛，柏林方面认为这不仅是政治反叛，也是军事反叛，明确指出，如果巴伐利亚有任何反叛政府的行动，将受到武力镇压。巴伐利亚反政府的政治格局，为纳粹党的暴动提供了机会。

在反对柏林政府的阴谋中，卡尔和洛索夫是闹分裂，企图使巴伐利亚脱离德国，而希特勒是要以巴伐利亚为立足点，夺取全国政权，建立大德意志帝国。希特勒反对卡尔、洛索夫的民族分裂主义，决定撇开他们独自发动暴动。

1923年11月8日，希特勒在慕尼黑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酒店发动政变，用武力劫持了正在这里作演说的卡尔、洛索夫和警察局长赛塞尔三巨头，宣布全国“革命”已经开始，他是德国政府首脑。虽然在鲁登道夫的劝说下，三巨头同意和希特勒一道向柏林进军，但是，“三巨头”对希特勒用手枪对他们的侮辱十分生气，在他们逃脱希特勒的监禁之后，洛索夫控制的军队和警察当局立即布置了镇压暴乱的计划。尽管有罗姆控制的一部分军队站在希特勒一边，尽管鲁登道夫企图以自己在军队中的威望来挽救暴乱的失败，他和希特勒带领党徒举行武装示威游行，企图乘机达到政变成功的目的，但暴动最终还是被镇压下去了。纳粹党被取缔，希特勒被捕入狱。

按照德国刑法，希特勒应按叛国罪判处无期徒刑。可是，他仅仅只叛五年徒刑，而法庭方面通知他，刑满六个月就可以享受缓刑的待遇。其余被告只判三个月拘禁，鲁登道夫宣布无罪释放。巴伐利亚法庭虽然宣布解散纳粹党，但巴伐利亚政府并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制裁纳粹党徒继续从事颠覆政府的活动。希特勒虽然禁锢囹圄，但仍能经常接见其党徒，策划如何保存纳粹党组织和自己的领袖地位。

这种宽仁的审判实际上是对希特勒暴动的褒奖，等于鼓励反叛国家的行为。希特勒入狱后不到九个月，1924年12月20日获释出狱，继续从事反政府活动。

啤酒酒店暴动为什么被镇压下去了，以前只是简单认为是垄断资产阶级还没有要在德国实行法西斯专政的需要，这种看法太简单了。此时的纳粹党在巴伐利亚境外还默默无闻，只是在暴动失败之后，希特勒才名声大震，当时柏林政府对这样一个小党还不甚了解。啤酒酒店暴

动之所以被镇压,一方面,柏林政府对巴伐利亚政府施加了压力,另一方面;是由于希特勒的鲁莽行动,侮辱了卡尔等三巨头,并不是他们不赞成反对柏林政府的主张,而是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之间矛盾斗争的结果。我们从卡尔在希特勒手下逃走後发布的布告中便可窥见一斑。布告说:“一些追求虚荣的人的背信弃义和欺詐行为,把已经形成的德国民族重新觉醒的行动变成一场令人作呕的暴行”(着重号是引者所加)⑥。卡尔使用背信弃义一词,说明他们同流合污过,所说民族重新觉醒的行动,说明他们认为希特勒的行动是符合民族利益的,这种符合民族利益的行为,只是由于希特勒的鲁莽行为而弄巧成拙,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找到巴伐利亚政府对纳粹党宽仁处理的注脚。

纳粹党在产生阶段虽然还不是一支十分重要的政治力量,但希特勒因1923年暴动成为全国著名的政治人物,为纳粹党以後的复兴奠定了基础。在审判希特勒案件时,不少国家的报纸都派记者到慕尼黑,希特勒因之在全世界也出了名。在充满狭隘民族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的国家里,希特勒在人们的心目中好象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

希特勒出狱后,巴伐利亚政府对其活动又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希特勒首先在巴伐利亚总理海因里希·赫尔德面前假惺惺承认啤酒酒店暴动的错误,表示循规蹈矩,再不攻击政府,从而骗取了巴伐利亚政府的信任,认为“这头野兽驯服了”,撤销了对纳粹党和“人民观察家”报的取缔,希特勒又得以重新组织党羽、东山再起。虽然后来巴伐利亚政府也禁止过希特勒演说,但没有从根本上对纳粹党采取有力的制裁措施,纳粹党的基层组织反而遍布全国各地。即使在危机阶段也在全国建立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汉堡、梅克伦堡、波莫伦、哥廷根、吕内堡、豪诺瓦等七个党区,在柏林也建立了一个党区。1925年,纳粹党又恢复到三万人。

从1929年经济危机开始,纳粹党之所以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是由于垄断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势力支持的结果。

在法西斯产生和奠基阶段,纳粹党主要是得到巴伐利亚驻军的支持,只有少数垄断资本家给纳粹党提供活动经费,如1923年啤酒酒店暴动时,希特勒和钢托拉斯主席蒂森建立了密切关系,蒂森给希特勒——鲁登道夫集团提供了十万马克的援助⑦,还有一些中小企业主也给纳粹党提供了一些经费。这是因为纳粹党的“纲领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混合物”⑧,它是打着反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旗帜,垄断资产阶级对纳粹党本质没有真正的认识,所以支持纳粹党的垄断资本家不多。

啤酒酒店暴动失败之后,希特勒决定改变斗争策略,“不再企图通过武装政变来取得政权,而是要捏着鼻子进国会同天主教议员和马克思主义者议员打交道”⑨,决心走议会道路夺取政权。这时,因啤酒酒店暴动纳粹党和国防军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同时,兴登堡在1925年当选总统后,不少军官团成员担任政府文职官员,自然同纳粹党的关系疏远了。为了寻求经济来源和上层有权威人物的支持,希特勒决定加紧投靠垄断资产阶级。从1926年开始,希特勒就开始了这种接触。1926年夏天,他周游鲁尔区各地,在非公开的会议上,向垄断资本家作演说,大肆鼓吹民族社会主义是维护私有财产,要求经济界要大力支持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煤炭大王基尔道夫被希特勒的宣传所打动,他后来在《普鲁士报》上写道:“我完全被他明确的论断所说服,并深为感动”,“希特勒用四个半小时的时间,向我详尽地解释了他的纲领。我请求领袖把他对我的这番谈话写成小册子。后来,这本小册子就用我的名义散发给工商界”⑩。这本小册子的散发,为争取工业界资本家的支持奠定了基础。

从1929年经济危机开始后,希特勒加快了投靠垄断资产阶级的步伐,不断地在垄断资本

家面前暴露了纳粹党的本质。纳粹党新闻发布官奥托·狄特里希说：“1931年夏天，元首突然决定有步骤地努力讨好有势力的工业界巨头。”^①垄断资本家为寻找新的政治力量摆脱经济危机，也频繁邀请希特勒参加他们秘密举行的会议。1932年1月27日，希特勒应邀出席在杜塞尔多夫秘密举行的三百个资本家参加的会议，蒂森出面介绍希特勒和企业界上层人物见面。希特勒在会上和盘托出纳粹党的真实纲领，他大肆攻击民主制度，斥责民主为“笨拙的统治，破坏的原则”，并声称“经济生活是靠个人权威而建立起来的”^②，要求资本家恢复对工会的权威，他说：“经济上按照劳动效率、个人价值建立起来的生活，实际上是与个人权威密不可分”^③。他还大肆攻击马克思主义，并叫嚷“我们有不可动摇的决心，把马克思主义在德国连根铲除”^④。希特勒向与会代表保证，如果他们支持他取得政权，他将向他们提出空前庞大的军事订货，并扬言要重建军队，解决“生存空间问题”。这一重建军队和夺取“生存空间”的蓝图，对追求巨额利润的垄断资本家产生了巨大吸引力。会议结束时，全体资本家起立，蒂森高呼“希特勒万岁”。奥托·狄特里希在《同希特勒一起上台》一书中指出：“1932年1月27日，将永远是德国民社党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这一天，元首成功地在德国西部工业巨头中间打下了缺口。”^⑤为了进一步争取垄断资本家的全力支持，希特勒干脆把1932年出版的纳粹党纲进行了修改，声称“对于私人大企业，民族社会主义绝不因其违背集团的利益而加以反对”。纳粹党这一条文的修改，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垄断资产阶级才真正认清了纳粹党的真面目，不少垄断资本家积极支持希特勒上台，为纳粹党提供巨额竞选费。

在1929年纳粹党代表大会上，基尔道夫说服了所有参加莱茵——威斯特发利亚煤业辛迪加的企业主，从1931年1月1日起，每售一吨煤抽五芬尼给纳粹党，每年向纳粹党提供几百万马克^⑥。还有钢铁公司的艾伯特·伏格勒，也给希特勒提供过援助。财政寡头胡根堡每年向希特勒提供二百万马克援助^⑦。除此之外，还有法本化学公司董事奥尔格·冯·施尼茨勒、钾碱工业的奥古斯特·罗斯特格和奥古斯特·狄恩、汉堡——美洲航运公司的古诺、科隆大银行家库特·冯·施罗德等，都不同程度提供了经济来源，希特勒每年至少得到二百万马克的援助。在这些垄断资本家中，首先最热心的是银行家沙赫特博士，他在1930年因反对杨格计划，于1930年4月2日辞去了德国银行行长的职务，同希特勒建立了密切关系，经常为希特勒出谋划策，在希特勒与国内财政界要人之间起着穿针引线的特殊作用。经沙赫特介绍，如德意志银行的施陶斯、商业和私营银行的莱因哈特、慕尼黑保险公司的施密特等认识希特勒，在经济上给纳粹党提供不少帮助。他还推荐了“柏林交易所日报”的经济编辑冯克任希特勒的经济顾问。其次是蒂森，他同希特勒的交往很早，对纳粹党提供很多援助，仅在1932年7月选举中就为纳粹党筹备了三百万马克。戈培尔在1932年4月15日日记中写道：“几位热心人士曾经会晤，并送给我们十万马克作为竞选费用”，在7月16日日记中又写道：“我为柏林区募得五万五千马克的竞选费”^⑧。纳粹党开展竞选活动，如果没有垄断资本家的支持，在1932年选举中是不会获得重大胜利的。

这些垄断资本家如此追随和支持纳粹运动，绝不是个人出于对希特勒的好感，而是反映了阶级利益上的一致。因为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同纳粹党是一致的。纳粹党的基本主张，也就是其外交政策目标，是“废除凡尔赛条约”和“建立一个德意志帝国”^⑨。希特勒狂热煽动民族沙文主义和民族复仇主义，其目的是要争取“生存空间”，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希特勒在1930年11月13日的演说中就直言不讳的表露：“一个民族奋斗的目标就是统治世界”^⑩。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对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凡尔赛条约》把德国殖民地剥夺殆尽，丧失了所有投资场所和贸易市场一直心怀不满。德国本身是一个资源十分缺乏的国家，原料不足，市场狭

窄，这样就产生了迅速恢复起来的生产能力同缺乏有保证的原料产地和市场之间的矛盾不断尖锐起来。德国垄断资产阶级也希望通过战争来解决这一矛盾，并通过扩军备战和侵略战争来获得利润，认为纳粹党是可以利用的，把希望寄托在希特勒身上。同时，垄断资产阶级希望通过战争来摆脱危机，正如布鲁宁所说：“全部重工业界看到没有任何办法来拯救危机”，在通货膨胀接踵而来的情况下，“终于从经济上加强了对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援助”②。

霍亨索伦王室成员同纳粹党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把纳粹党看成是恢复旧帝制的希望，积极支持希特勒上台。这种关系的建立主要是从1926年以后。1926年2月，根据魏玛宪法，德国要举行公民投票来决定是否对“十一月革命”中被没收的霍亨索伦王室的财产予以赔偿。希特勒用高压手段战胜了赞成没收王公贵族财产的党内左翼力量的代表奥托·施特拉塞尔派，宣称“贵族私有财产问题甚至不许碰一碰”③，坚决站在君主制立场上，“坚决捍卫私有制原则”④。因为当时这些王公贵族里就有不少人给纳粹党在经济上提供援助。为了报答希特勒的庇护之恩，威廉二世让奥古斯特·威廉皇子参加了魏玛纳粹党代会，1928年又加入冲锋队，把纳粹党看作是重登皇位和恢复君主政体的政治力量。在1932年总统选举中，弗里德里希·威廉太子，在《西里西亚报》上公开发表拥护希特勒的声明：“为了一个统一的民族阵线，我将在第二轮选举中选举希特勒”，“只有希特勒才能使德意志民族雪耻”⑤。在这次选举中，大多数容克贵族站在希特勒一边，使希特勒在第二轮选举中增加了二百万张选票⑥。1932年秋，戈林和威廉二世进行了一周的会晤，1932年下半年，霍亨索伦王室成员还同希特勒代表就关于在德国重建君主政体问题进行了谈判。1933年1月22日，希特勒和戈林宴请前皇太子，皇太子致函兴登堡，敦请总统授权希特勒组阁。不仅如此，威廉二世还给纳粹党提供了二百万马克的援助。在法西斯崛起的过程中，霍亨索伦王室的支持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代表容克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德国国防军，随着兴登堡在1925年的上台，在政府中的作用大大加强了，成为左右德国政治的一支重要力量。希特勒为实现通过议会道路夺取政权，决心重新取得国防军的信任，恢复同国防军之间的关系。为此，他极力挑拨共和国和国防军之间的关系，大肆散布共和国出卖了陆军，在1929年3月15日的演说中，鼓吹陆军支持共和国，就是“德国陆军的末日”，“你们到了那时可能成为那个政权和政治委员的刽子手，如果不听话，你们的妻儿将被囚禁。如果你们仍不听话，你们就会被一脚踢开，也许在墙前就刑”⑦，要求陆军支持民族社会主义运动。

同时，纳粹党在军队中的影响不断扩大，在军队基层官兵中产生强烈反响。陆军曾禁止征募纳粹党人参加十万人组成的国防军，还禁止纳粹党人在军火库、兵站担任文职工作。可是到了1930年，陆军对纳粹党又发生了兴趣，为希特勒狂热的民族主义宣传所吸引，尤其是希特勒表示上台后，重建一支庞大的陆军，恢复昔日的光荣和骄傲，实现复仇主义，从而为不少渴求升官晋级的军官描绘了一幅美好前程，不少基层官兵加入了纳粹党。

1930年夏季，希特勒利用法庭审判乌尔姆卫戍部队卢丁、施林格和温特三名年轻尉官的机会⑧，以出庭作证人的机会向陆军表示忠心，从而赢得了陆军上层人物的支持。他采取欺骗的政治手腕，在法庭上宣称纳粹党和冲锋队都不反对陆军，他说：“任何要想取代陆军的尝试都是发神经病。我们没有一个人想取代陆军……我们将努力做到，在我们执政以后，以目前的国防军为基础，一支伟大的德国人民的军队将会兴起”⑨，并表示纳粹党只想通过合乎宪法的途径去取得政权，“我们的运动不需要暴力”⑩。希特勒还在法庭上解释“民族革命”的含义，所谓“民族革命”就是“拯救我们今天的被奴役的德意志民族”，就是指反对《凡尔赛条约》，“如果我们尽我们一切力量反对这些条约，我们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⑪。希特勒这些保

证和思想，正中军官们下怀，认为纳粹党不会破坏陆军。陆军将领冯·西克特将军在1930年9月当选为国会议员后，公开和希特勒合作。陆军态度的转变，为纳粹运动的发展和希特勒最后夺取政权起了重要作用。

希特勒就是在垄断资产阶级和国防军等反动势力支持下上台的，法西斯才得以在德国蓬勃兴起。1932年，纳粹党虽然在议会中成为第一大党，但仍然没有获得组织政府所需要的绝对多数票，只占百分之三十七点二。从1932年下半年开始，纳粹党面临危机，一方面，由于革命运动空前高涨，不少人民群众认清了纳粹党的真面目，不再支持纳粹党，同时，纳粹党经费短缺，债务高达八百万马克，没有足够经费进行竞选，因此，在11月6日选举中丧失了二百万张选票。另一方面，纳粹党内出现分裂危机，施特拉塞尔同希特勒发生分歧，他和不少党徒因而脱离纳粹党。面对纳粹党危机局面，希特勒起了自杀的念头，他说：“如果党瓦解，我在三分钟内就用手枪自戕”^⑩。然而，正是在纳粹党发生危机，通过议会选举无法夺取政权的情况下，垄断资本家急于把希特勒扶上台。1932年11月11日，由巴本、沙赫特、科普勒等起草，并由五十名工业家、银行家和大地主签名给兴登堡总统写了一份请愿书，要求任命希特勒为总理。1933年1月26日，陆军部长施莱彻尔和国防军司令哈麦施泰因会商后一致认为，希特勒是唯一能够解决政府危机的候选人，积极支持希特勒上台。希特勒讨好国防军的努力终于起了作用，军队在关键时刻站在法西斯一边，为希特勒通向德国总理宝座铺平了道路。在垄断资本家、大地主和军国主义分子支持下，兴登堡总统终于合法地把政权交给了希特勒，法西斯从而迅速崛起，在德国实行全面的专制独裁统治。

注释：

① 《列宁全集》第31卷，第291—292页。

② 亚历山大·阿布施，《民族的歧途》(Alexander Abusch, Der Irrweg einer Nation)，柏林1951年版，第219页。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纽约1962年版，第32、33、119、143、128、139、140、140、141页。

⑪ 希特勒在自杀前的政治遗嘱中，也把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责任归在犹太人的头上，认为“真正的罪魁祸首是犹太人”，并要他的继任者“恪守种族法律，坚决抵抗世界各民族的毒化者——国际犹太人”（格哈德·博尔特，《最后十天》(Gerhard Boldt, Die Letzten zhen Tage)，法兰克福1973年版，第119、201页）。

⑫ 冯·瓦尔特·霍费尔编，《民族社会主义文件集(1933—1945)》(Von Walther Hofer,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Dokumente 1933—1945)，法兰克福1957年版，第21—22页。

⑬ E·茨肖恩，《谁扶助了希特勒上台》(E. Czichon, Wer verhalf Hitler Macht)，科隆1978年版，第15页。

⑭⑮ 赫尔曼·腾博尔克，《德国历史》(Hermann Tenbrock, Geschichte Deutschlands)，慕尼黑1977年版，第276页。

⑯⑰⑱ 阿伯特·诺尔登，《德国历史的教训》，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36、143、80页。

⑲⑳㉑ 鲁格、舒曼编，《德国历史文件集(1929—1933)》(Ruge/Schumann, Dokumente zur deutschen Geschichte 1929—1933)，法兰克福1977年版，第57页。

㉒ 保罗·汪戴尔，《德帝国主义与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121页。

㉓ 内尔肯，《在希特勒发动战争的幕后》，柏林1946年版。引自维戈兹基等编《外交史》(3卷)，第574页。

(下转 第74 页)

生过平均地权主义的“无身份之分的帝国”一样。强盗大王的儿子可以通过阅读家族秘史而学习，从而减少对较大的历史运动加以默认的必要性——这些运动要求他以私人利益服从公众利益，以商业动机服从民族和帝国的利益。他走出资本家的理事会会议室，以新成员的身份加入强有力的男子汉统治阶级，全力以赴，对内巩固阶级统治，对外加强帝国的扩张。

这就是罗斯福边地神话的最后赠品。我们要从边地的往昔得到的东西，是一个关于英雄领袖阶级的神话或梦想。这个阶级既是平民式的，又是贵族式的，漫不经心地进行着统治；它生而具有这个阶级的品德，同时又要自己挣来这种品德；它出于民主的襁褓，继而长入官僚和帝国的成人期；它能够取商业主义而代之，又是商业主义的产物；它明智，开通，置身于阶级斗争和商业竞争之外，在思想上又一贯是为着公众和种族的。这就是我们至今还没有摆脱的神话。

注释：

① 弗莱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尔，Frederick Jackson Turner，美国现代历史学的创始人，其最重要的著作为《边地的假说》(Frontier Hypothesis)。

② 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曾于1900年至1908年任美国总统，为美国进步共和党领袖及主要发言人。1898年至1902年间，罗斯福极力宣扬帝国主义。

③ “命定之说”，Manifest Destiny，欧萨利文创立的理论，宣扬美国对整个北美洲的扩张和征服是符合自然、历史规律和地理条件的，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及九十年代曾两度风行一时。

④ 库柏，Fenimore Cooper，美国十九世纪文学家，以描写边地的小说而著名。

⑤ 弗兰西斯·帕克曼，Fransis Packman，美国十九世纪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其主要著述集中于美国独立战争以前的矛盾冲突。

⑥ 罗伯特·罗杰斯，Robert Rogers，骑兵司令，在1755年到1764年的对法(国)印(第安)战争中做过侦察员。丹尼尔·布恩，Daniel Boone，猎人，肯塔基州的开拓者，在美国革命时期极为活跃。克罗凯特，Crockett，边地开拓者，政治家，著名作家，在1812年到1814年对印第安战争中极其活跃；1835年到1836年率兵征服得克萨斯。吉特·卡尔森，Kit Carson，猎人，墨西哥战争期间的开拓者。山姆·休斯顿，Sam Houston，对印第安战争中的著名军人，政治家，得克萨斯革命的领袖兼总司令。布法罗·比尔，Buffalo Bill，原名威廉·寇得(William Code)，侦察员，猎人，对印第安战争中的军人，以创立“荒野西部演出”(将征服西部的故事编成剧目搬上舞台)而著名。

⑦ 克列瓦考尔，Crevecoeur，法国文学家，《美国农场通信》一书的作者，在法国革命时期将美国自由思想介绍了到欧洲。

⑧ 草市广场，美国内战后，芝加哥草市广场曾爆发群众罢工集会，与会者被污蔑为无政府主义者而遭迫害。

⑨ 撒克逊……，这些种族全都属于日尔曼人种。

⑩ 安德鲁，Andrew，库列瓦考尔小说中人物，本为贫穷的苏格兰人，到美国后，在边地辛勤劳作而发家致富。

⑪ 希克拉尼亚，Hycranian，地中海东南地区。

⑫ 齐格非，Siegfried，日耳曼古代英雄。

⑬ 克拉克，Rogers Clark，革命战争时的美军司令，将英国人及其印第安联盟逐出西北领土。

⑭ 韦恩，Anthony Wayne，革命战争时期之美军司令，于1794年击败英印(第安)同盟，打通向西部移民的道路。

(上接第88页)

⑮ 蒂森，《我资助过希特勒》，纽约1942年版，第98页。引自维戈兹基等编《外交史》(3卷)，第574页。

⑯ 塞巴斯蒂安·哈夫纳，《希特勒评传》(Sebastian Haffner, Anmerkungen zu Hitler)，慕尼黑1978年版，第101页。

⑰ 埃米尔·卡尔勒巴赫，《从布吕宁到希特勒》(Emil Carlebach, Von Brüning zu Hitler)，法兰克福1974年版，第36页。

⑱ 德波林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167页。

⑲ 见东德《历史杂志》1981年第10期《霍亨索伦与法西斯的关系》一文。

⑳ 第一轮选举中，希特勒获1134万张选票，第二轮选举上升到1342万张。

㉑ 1930年春季，乌尔姆卫戍部队的卢丁、施林格、温特三名年轻军官在军队中宣传纳粹理论，并企图劝诱同事们在纳粹武装政变时不要向纳粹开枪。此事被认为是离间军队、搞分裂，三人以叛国罪被捕。希特勒在法庭作证时，为了讨好军队，否认纳粹要发动叛乱，并出卖了这三位军官，三位军官均以叛国罪判处18个月的炮台禁闭。